

第一章 绪论

韩人^①在朝鲜王朝中期就已开始越过鸭绿江进入中国境内，但是大规模海外移民却出现在19世纪60年代。1869年和1870年韩国北部发生自然灾害造成农业大面积的减产导致发生严重的饥谨。一部分韩人为了生存开始移居到中国的东北和俄罗斯的沿海地区。以后随着韩国的开港，封建的经济体制逐渐走向崩溃，大批的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手段即土地，为了寻找活路，不少农民开始向海外移民。在向海外移民的初期，韩人主要移居到与韩国接壤的中国东北和俄罗斯的沿海地区。进入20世纪之后，韩人开始向美洲移民，1903年至1905年，移民到美洲和夏威夷的韩人达7,226名。^②在这一时期移居到海外的韩人中，大多数是为了生计而移民的，政治亡命者并不多见。

韩人的政治移民从1905年日本强迫韩国政府签订《己巳保护条约》后开始急剧增多。此后韩人的海外移民经历了两次高潮，一次是1910年日本强迫韩国政府签订《韩日和邦条约》开始对韩国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众多韩人以“只要能避免日本的殖民统

^① 1392年李成桂建立了朝鲜王朝，从此之后一直到1897年都使用“朝鲜”的国号。1897年朝鲜改国号为“大韩帝国”，1910年日本吞并之后，仍称其为朝鲜。近代中国的媒体对来华的韩国人使用了多种称呼，如“朝鲜人”、“韩人”、“高丽人”等。为了称呼上的统一，除了引文之外，本书中一律使用“韩人”的称呼。关于民族或国家的称谓，除了引文和专有名称之外，一律使用“韩国”。

^② 辛承丽：《夏威夷移民时略：通过人脉看生活的现状》，韩国高丽大学校民族文化研究所，1988。

治就行“的心情开始移居海外。韩人政治亡命的第二次高潮出现在1919年的三一运动之后。1919年3月1日韩国爆发了全民族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这场全民族的斗争遭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血腥镇压，韩国陷入日本殖民统治的白色恐怖之中，很多独立运动者为了开展反日独立运动，不得不移居海外。就韩人的移居地区来看，也不再限于与韩国接壤的国家和美洲、夏威夷地区，中国关内地区、欧洲各国等都成为韩人的移居地。移居各地的韩人聚集而居，在当地先后形成了韩人的侨民社会。

光复之后，韩国史学界开始了对海外韩人社会的研究工作，最早的研究主要由移居海外韩人的后裔进行的，研究成果并不是很多。^①也有韩国学者从移民史的角度对海外韩人社会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②由于处于起步阶段，这些研究多多少少存在一些问题，玄圭焕的研究主要偏重于资料的整理，高承济的研究主要偏重于韩人社会的经济史，辛承丽的研究主要偏重于一些重要人物的活动。除此之外，许多韩国学者也从事韩人社会的研究，但主要集中在对当代韩人社会现状的分析和研究。

进入80年代随着韩国政局的变化韩国史学界对独立运动史的研究开始活跃起来，出版的相关研究著作数不胜数。然而在独立运动史的研究热潮中，一些学者开始意识到这种研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那就是缺乏对海外韩人社会的研究。^③独立运动是在韩人社会的基础上展开的，没有了这种社会基础，独立运动也无法展开。正像曾参加独立运动的郑华岩所说“就是再从事独立

海外韩人后裔对海外韩人社会的研究只有金元用的《在美韩人50年史》，1959。

从移民史的角度对韩人社会的研究主要有：

玄圭焕：《韩国流移民史》（上）语文阁，1967；

高承济：《韩国移民史》章文阁，1973；

李尚根：《韩人露领移住史研究》探求堂，1995；

辛承丽：《夏威夷移民史略：通过人脉看生活的现状》，韩国高丽大学校民族文化研究所，1988。

[韩]朴永锡：《日帝下在满韩人社会研究》，《国史馆论丛》1，1989。

运动也首先要穿衣吃饭要生存”。^①换句话说，韩人社会的人力、物力资源是民族独立运动得以展开的基础。因此要深刻理解海外韩人的独立运动，就必须研究作为独立运动的社会、经济基础的韩人社会。在这种认识下，从80年代中期，韩国史学界开始重视海外韩社会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②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对海外韩人社会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还有许多问题有待研究。比如，在海外韩人社会之中，上海韩人社会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关于上海韩人社会的研究却很少见到。

上海韩人社会曾是作为海外韩人独立运动总指挥部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赖以存在并领导独立运动的社会基础。而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为中心展开的独立运动、民族教育运动等如果没有上海韩人社会的支持是很难想象的，也就是说民族独立运动只有在上海韩人社会的人力、物力资源的基础上才能展开。因此在撇开上海韩人社会来研究韩人在上海展开的独立运动就好像是空中楼阁一样，缺乏令人信服的基础。因此说研究上海韩人社会是研究韩人在上海展开的独立运动的基础一点也不夸张。近年来韩国史学界关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地位的争论也再次说明了上海的韩人社会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及其领导的独立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独立运动史上的地位及其评价，也只有通过对临时政府对韩人社会的领导力的客观探讨才能解决。^③

全面阐述上海韩人社会，重新再现当年韩人社会的全貌，将有助于推动近代海外韩人社会史的研究。在日本殖民统治期间，

[韩] 郑华岩：《祖国要走向何方 我的回顾录》，汉城图书出版自由文库，1982，第92页。

② 这时期发表的有关海外韩人社会的研究成果有朴永锡：《日帝下在满韩人社会研究》，《国史馆论丛》1，1989；金义焕：《日帝下在日同胞社会的分析研究》，《国史馆论丛》13，1989等。

③ [韩] 薛春植：《对上海临时政府的人士存在着问题》，《历史批评》1988年春季号；[韩] 卢景彩：《“临时政府”做了多少独立运动工作》，《历史批评》1990年冬季号。

在中国关内的上海、重庆、南京、天津等独立运动基地都形成了韩人社会，对上海韩人社会的研究只是对中国关内地区韩人社会研究的第一步。今后将在总结研究上海韩人社会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有计划地系统研究中国关内各地区的韩人社会，构筑一部中国关内地区韩人社会史。

此前对上海韩人社会的研究主要是从独立运动的视角出发的，对于上海韩人社会的诸般情况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也就没有关于上海韩人社会诸方面的实证研究。就是对于韩人在上海展开的独立运动的研究也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比如关于作为韩人独立运动的社会基础的上海韩人社会的形成及其性质变迁的研究很少有人提及。因此笔者力图克服既有研究成果的局限性，多方位、多视角地对上海韩人社会进行全面的 research。

韩国开港之后，就有韩人来到上海，但是上海韩人社会的形成却是 20 世纪 20 年代初的事情。此后，随着国际局势和中国政局的变化，韩人社会也经历了众多的变化，并一直维持到 1945 年韩国光复。光复之后，大批的韩人回国，内陆各地的韩人也陆续经过上海回国。也有相当一部分留在上海，上海的韩人组织如韩国侨民协会、韩商总会、韩侨妇女会等也重新组织起来，^① 上海唯一的韩侨小学仁成学校也于 1947 年 3 月 1 日复校。^② 由此可见，即使在光复之后，上海仍存在着韩人社会。但是这个时期的韩人社会与以前的韩人社会有很大的不同，同时上海的特殊环境也不复存在。因此本书把研究的时间范围设定为韩国开港之后到 1945 年韩国光复为止，研究的内容包括了韩人移住上海的过程和韩人社会的形成，韩人的社会组织和社会阶层构成及其特征，韩

^① 旧上海市政府社会局档案：《韩国侨民协会》、《上海韩商总会》、《韩侨妇女会》，上海档案馆所藏，全总号 6，目录号 5，案卷号 1067-1068, 1143。

^② 旧上海市政府社会局档案：《韩国侨民协会》，上海档案馆所藏，全总号 6，目录号 5，案卷号 1067。

人的职业和社会经济状况，韩人社会的教育、文化和宗教以及韩人的法律地位等，涉及了韩人社会的各个方面，力图能给人们一个对上海韩人社会全面的、整体的认识。

早在韩人来到上海开展独立运动时就已经开始了对自身活动的记述。1920年在上海出版、由朴殷植所著的《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就详细叙述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过程，金光在1933年出版的《尹奉吉传》全面介绍了虹口公园爆炸案从策划到实施的全过程。从亲日的立场叙述上海韩人问题的文章也不少见。曾任亲日的上海居留朝鲜人会长的李甲宁就曾多次撰文介绍上海的韩人社会。^①所有这些可以说是有关上海韩人社会的最初记录。

对上海的韩人社会进行学术研究是从韩国光复之后开始的，至今已几十年过去了，在这期间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为后人研究这一问题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但是在这些研究成果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之处。首先就韩人移居上海的过程和韩人社会的形成这一问题来看，此前并没有关于这一问题的专门研究，只是在一些相关问题的研究中有所涉及。^②但是这些研究并不是在对韩人社会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其得出的结论往往是谬误甚多。例如金喜坤曾主张“1910年前后上海已经形成了小规模的同胞社会”，^③但是这个时期居住在上海的韩人只有几十名，且分散居住在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它们之间的来往也不多。当时居住在上海的闵泳翊曾说自己不愿意见到任

[韩]李甲宁：《上海に於ける朝鮮人問題》，《上海》1936年7月号；《上海的近况和在留朝鮮人生活相—李甲宁氏和本誌记者の対話録》，《三千里》第12卷第8号，1940年9月。

金喜坤的《中国关内韩国独立运动团体研究》（汉城知识产业社，1995）曾涉及韩人移居上海的路线和韩人社会的形成，千敬化的《日帝下在中国韩国人民教育运动研究》（《国史馆论丛》9，1989）也曾提到上海韩人的增加趋势。

[韩]金喜坤：《中国关内韩国独立运动团体研究》，汉城知识产业社，1995，第38页。

何韩人。也就是说这个时期韩人社会形成所必须具备的共同居住区域、社会组织和集团意识等条件并不存在，因此这种主张不免过于草率。而且金喜坤在自己的著作中也没有用具体的事实阐述韩人移住上海的背景、时期和路线，更没有说明韩人社会的形成时期和过程。其实 1917 年 7 月韩人在上海发表《大同团结宣言》之后，韩人社会才开始逐渐形成。^① 因此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只有在占有大量资料并对这些资料进行深入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其次是关于韩人的社会团体和韩人社会的性质。关于上海韩人的社会团体研究成果很多既有专著也有论文既有从整体上研究上海韩人的社会团体的，^② 也有研究以韩国独立党为代表的各政党和团体的。^③ 这些团体作为“独立运动政党”在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运动中履行了神圣的使命。^④ 但是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上海韩人社会的政治团体，当然也有关于韩人社会的侨民组织大韩侨民团的研究，不过这些研究也是主要阐述侨民团所展开的独立运动，^⑤ 对于侨民团所起到的社会功能很少涉及。

① [韩]赵东杰：《为建立临时政府做准备的 1917 年‘大同团结宣言’》，《韩国学论丛》9，韩国国民大学校韩国学研究所，1986 第 123 至 156 页。

② 从整体上研究上海韩人的社会组织的成果有前面提到的金喜坤所著《中国关内韩国独立运动团体研究》。

③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多，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金喜坤《同济社的成立及活动》

1985。

——：《韩国劳兵会的成立及其独立战争准备方略》，《尹炳奭教授甲申纪念韩国近代史论丛》汉城知识产业社，1990；

慎镛履：《新韩青年党的独立运动》，《韩国学报》44

姜万吉：《朝鲜民族革命党成立的背景》，《韩国史研究》61、6 合刊，1988，

——：《朝鲜民族革命党和统一战线》，汉城和平社，1991

金昌洙：《韩人爱国团的成立及活动》，《韩国独立运动史研究》12，1988；

赵凡来：《韩国独立党研究（1929 - 1945）》，《韩国民族运动史研究》2，1988；

卢景彩：《韩国独立党的成立及其变迁（1930 - 1945）》，《历史与现实》创刊号，1989，

——：《韩国独立党研究》，汉城新书苑，1996；

金荣范：《韩国近代民族运动和义烈团》，汉城创作与批评社，1997 等。

[韩]卢景彩：《日帝下独立运动政党的性质》，《韩国独立运动史研究》2，1988。

关于上海大韩侨民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金喜坤：《上海大韩人民团的成立和独立运动》《水邨朴永锡教授甲申纪念韩民族独立运动史论丛》探求堂，1992；

琨：《上海大韩侨民团的成立和活动》韩国东国大学校硕士论文，1996。

由亲日韩人组织的侨民团体上海居留朝鲜人会则根本无人提及。

对于上海韩人社会的阶层构成特征、韩人社会的性质及其变迁更是无人涉及，以至于给人这样一种认识，即韩人社会自形成时到 1945 年韩国光复都是一个以独立运动为理念的“政治社会”，移居上海的韩人都是从事独立运动的。事实并非如此，上海韩人社会形成之后，随着国际局势和中国政局等多种因素的变化，韩人社会的性质也发生了诸多变化，移居上海的韩人也并非全是独立运动者，其中也有普通的韩人，甚至不乏充当日本侵华走狗的韩人。因此，只有充分分析韩人社会的阶层构成及社会性质的变迁，才能认识上海韩人社会的全貌。

第三是关于韩人社会的经济生活。刚才曾提到在上海的韩人并不全是独立运动者，即便是独立运动者，也要首先解决生存问题，然后才能从事独立运动。因此，不仅是普通的韩人在上海要么从事经营，要么在上海的公司或工厂就职，就是独立运动者，也在从事独立运动的同时有着自己的职业。但是此前并没有关于韩人经济生活如韩人的职业、收入以及生活水平等方面的研究。只有全面分析作为独立运动社会基础的韩人社会的经济生活，才能全面地、深刻地理解韩人在上海展开的独立运动。特别是最近韩国经济史学界的一些学者提出了“殖民地经济开发论”、“殖民地近代化论”的观点，^①按照这种观点日本在韩国的 36 年殖民统治与其说从“侵略与抵抗”的角度去理解还不如从“侵略与开发”、“掠夺与开发”的角度去理解。如果从这种观点出发去看这段历史的话，那么近代韩人背井离乡，冒着生命危险所进行的反日独立斗争将失去意义，如果再进一步来讲，如何评价以三一运动为主的国内外各阶层人民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也

^① [韩]安秉植：《韩国的经济发展和近代史研究》，《第 38 届全国历史学大会发表文》，韩国历史学会，1995。

成问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阐述韩人独立运动者在为了祖国独立和民族自由展开反日独立斗争的过程中所处的经济环境及所遭遇的经济困境，比任何时候都更有意义。

第四是关于上海韩人社会的教育、文化和宗教问题。到目前为止，关于上海韩人的教育问题还是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①但是这些研究成果主要偏重于叙述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为中心展开的民族教育活动，对于韩人社会整体的教育问题没有进行深入研究。换句话说，这些研究成果没有涉及到韩人是如何解决子女的教育问题的，韩人子女主要在什么样的学校学习，上海的韩人学生组织了什么样的团体、开展了哪些活动等问题。韩人在展开反日独立运动的同时，也展开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这些文化活动为远离祖国的韩人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丰富了韩人的生活，同时对保存韩国的传统文化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关于上海韩人文化活动的研究，只是在一些相关论文中略有提及。对于上海韩人社会的宗教问题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基督教与民族独立运动的关系上^②对于在韩人独立运动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大宗教、天道教等也没有人涉猎。

第五是关于上海韩人的法律地位和司法问题。韩国学界普遍认为在近代上海的租界里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列强行使着各种统治权，中国政府根本无权干预租界的任何事务。^③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从设立租界时起到1942年废除租界为止，只有在

^① 关于上海韩人社会教育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刘准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教育、文化和宣传活动》，《韩民族独立运动史》7，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90；
李明花：《上海韩人的民族教育运动》，《韩国独立运动史研究》4，1990；
千敬化：《日帝下在中国韩国人民教育运动研究》，《国史馆论丛》9，1989；
崔志鹰：《韩国临时政府在上海的教育活动》，《档案与史学》，1995年5月。

^② 关于上海韩人社会宗教问题的研究成果只有金亨锡的《上海居留韩人基督教徒的民族运动》，《龙岩车文燮博士甲纪念史学论丛》，1989。

^③ [韩]金喜坤：《中国关内韩国独立运动团体研究》，汉城：知识产业社，1995，第31至32页。

1911年至1926年中国政府无法介入租界的司法问题，在其它时间内，中国对租界的司法问题具有管辖权，因此近代上海影响到韩人的司法地位的有公共租界当局、法租界当局和中国政府。对于韩人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的法律地位和司法问题，学术界并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也没有专门的研究成果问世。在这种条件下要谈全面、准确地理解上海韩人社会恐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第六是关于上海韩人社会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关系。韩人离开祖国来到异国他乡的上海，虽然可以与同在上海的同胞往来，但是接触最多的、来往最多的还应该是中国人，而中韩两国相近或相似的文化及风俗习惯、历史上中韩之间所保持的密切往来关系以及近代同遭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命运也促进了上海韩人与中国人的交往。因此近代上海韩人社会与中国人社会保持着密切关系，这种关系最主要地体现在政治活动中，即中国政府和民间人士及民间团体积极支持韩人的反日独立运动，尽管各时期政策有所变化。同时韩人也积极参加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关于这一问题，韩国学界进行了很多研究，也取得了不少的研究

成果,^①国内学界对此问题也有所研究。^②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上,也有一些是个别韩人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或个别中国人与韩人独立运动的关系,缺乏从整体上论述中国政府各个时期对韩人及韩人独立运动的政策的研究,更缺少对韩人及韩人独立运动与中国民间人士和民间团体的关系的考察。

综上所述,无论是韩国学界还是中国学界,对于上海韩人社会的研究存在着不少问题,也有许多未曾涉及的问题。本书在努力克服所提出的问题的同时,对尚未有人探讨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从多视角出发重新认识上海韩人社会。

本书通过对上海韩人社会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力争再现上海韩人社会的全貌,并通过对韩人社会的研究,探讨上海韩人社会与独立运动的关系。本书共分八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目前为止学术界对上海韩人社会的研究以及存在的不足之处。第

关于这一问题的主要研究成果有:

辛胜夏:《纵观申圭植和中国革命党人的关系》,《金俊烨教授华甲纪念中国学论丛》,1983。

——:《民国初年的军阀和韩国独立运动》,《韩民族独立运动史》16,1989。

洪淳钰:《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对中国外交》,《韩国独立运动和列强的关系》,汉城平明社,1985。

任桂淳:《中国政府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支援》,《韩国史学》8,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1986。

姜德相:《中国国民革命と吕云亨》,《三千里》第49期,1987。

李铉熙:《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以相互外交政策关系为中心》,《转换期的韩国社会》,汉城法文社,1988。

张世胤:《中日战争时期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对中国外交:以光复军问题为中心》,《韩国独立运动史研究》2,1988。

韩相禔:《日帝下在中韩人独立运动的国际背景:以和中国军阀政权及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为中心》,《建国史学》8,1993。

——:《韩国独立运动和中国军官学校》,汉城文学和知性社,1994。

卢景彩:《中国关内朝鲜人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中国国民党》,《亚细亚文化》13,韩国翰林大学校出版部,1997。

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有:

胡春惠:《韩国独立运动在中国》,台北“民国”史料中心,1976。

——:《朱家骅与韩国独立运动》,《水邨朴永锡教授华甲纪念韩民族独立运动史论丛》,探求堂,1992。

沐涛、孙科志:《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石源华:《论战时中国国民政府的援朝政策》,《水邨朴永锡教授华甲纪念韩民族独立运动史论丛》,探求堂,1992。

二章主要分析韩人移居上海和韩人社会的形成。近代上海是东方最大的国际大都市，也是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思想文化传入中国的窗口，同时又是一个繁华的商业都市，因此初期到上海的韩人主要是那些政府官吏、商人和求学的学生。近代上海除了中国政府管辖的区域之外，也存在着西方列强管理的租界，这种特殊的条件也使得中国革命党人把它当作从事革命活动的中心。由于存在着这些有利条件，韩人很早就把上海当作建立海外韩人独立运动基地的最佳地点，众多的韩人独立运动者为了这一目的来到上海，一些韩人为了商业利益或寻求职业也来到上海，结果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终于形成了韩人社会。本章对韩人移住上海的背景、移住的路线、移住的时期及韩人社会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充分的探讨。

第三章主要分析了韩人的社会团体和阶层构成，并通过对社会阶层构成进行动态的分析，阐述了上海韩人社会的性质及其变迁。上海韩人在展开反日独立运动的同时也组织了许多团体，这些团体有政治团体，也有非政治团体，像经济、侨民亲睦等团体。在本书中，著者把韩人组织的团体分为政治团体、侨民团体，特别是对侨民团体进行了重点的研究。韩人社会的阶层构成与其它地区的韩人社会相比有着不同的特征，这种特征也导致上海韩人社会与其它地区的韩人社会相比有着自己独特之处。上海韩人社会性质也随着社会阶层的变化经历了众多的变化，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一直保持着独立运动的特色。

第四章主要是关于韩人社会的经济生活的研究。韩人的经济生活是韩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韩人经济生活的研究能帮助我们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上海韩人社会。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在上海的韩人并不全是独立运动者，其中也有不少是为了生计移居上海的，即使是独立运动者也要首先解决生存问题才能从事革命运动。正因为如此，许多韩人独立运动者在展开革命

活动的同时，也从事着这种或那种的职业。特别是 30 年代之后，随着韩人社会政治色彩的淡化，韩人的经济生活开始充满了活力。在本章中，著者从职业、收入和生活水准等方面对韩人的经济生活进行了全面的考察，通过这种考察，一方面阐述韩人的生活状况，另一方面也说明韩人独立运动者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展开反日独立运动，其精神是何等的难能可贵。

第五章是关于韩人社会的教育、文化和宗教问题的研究。在殖民统治期间，日本在韩国国内实施殖民主义教育，竭力抹煞韩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为了培养韩人后代的民族精神，韩人在上海设立了专门的教育机关，对韩人子女重点进行民族主义教育。当然也有一些韩人在中国的各级学校、西方人和日本人等开办的学校就读，情况相当复杂。上海韩人社会的文化和宗教活动也有着与上海的其他侨民社会所不同的特点。

第六章是关于上海韩人法律地位和韩人社会的司法问题的考察。近代上海既有 12 个国家的代表参与管理的公共租界，也有法国单独管理的法租界，此外还有中国政府管理的区域。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保持着相对独立的行政管理体系，而公共租界由于有日本人参与管理，日本对其的影响很大。因此可以说在上海存在着各种政治势力，他们对韩人的政策也不相同，这样韩人的法律地位也不尽相同。在本章中，著者考察了租界司法制度的沿革，各种政治势力对韩人不同的政策，也对上海韩人社会的司法问题进行了探讨。

第七章主要阐述了上海韩人社会与中国社会的关系。韩人社会与中国社会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政治方面。本章从中国政府对韩人的立场和态度、中国民间对韩人的态度以及中国的政治、文化活动中韩人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

第二章 韩人移住和韩人社会的形成

第一节 开港初期的上海韩人

一、开港后的上海

隋唐时期，随着贯通南北的大运河的开通，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逐渐南移，到了元朝，当时的中央政府把黄浦江两岸的高昌、长人、北亭、海隅和新江等地合并起来，设立了上海县。上海县的设立成为上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契机。这一时期，上海地区以植棉业为中心的农业取得了较快的发展，植棉业的发展又促进了以棉纺织业为中心的手工业的发展。海运业的发展也成为上海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到了明朝，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一带由于倭寇的侵扰，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但是随着上海县城的构筑，上海的城市商业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明末，上海已发展成为棉纺织业的中心。当时“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①

到了清朝，上海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以棉纺织业为中心的手工业中，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到鸦片战争之前，上海已经成为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商业中心，同时也是重要的贸易港口，特别是在同日本的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

^① 叶梦珠：《阅世编》卷七，转引自丁日初主编：《上海近代经济史 1843～189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4页。

从上海出发的商船“有原行货海外者，较远人颇便，大概商于浙闽及日本居多”¹⁹⁴；往来海舶“俱入黄浦编号，海外百货俱级”。作为埠际贸易的港口，上海在开埠前早已有相当水平。^①上海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和优越的地理位置为其日后发展成为国际大都市奠定了基础。在开港之前，欧洲国家就已经开始对上海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19世纪20年代就有英国的船只探测上海的航道，收集有关情报。^②

1842年8月，由于在鸦片战争中战败，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根据《中英南京条约》第3条，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被作为通商口岸对英国开放，1843年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尔福（George Balfour）来到上海，这标志着上海正式开港。

开港之后，外国的产品通过上海像潮水般地涌入中国，外国商人也开始在上海设立公司，销售从外国进口的商品。以上海为中心的江苏、安徽和浙江一带是西方各国所需要的蚕丝和茶叶的主要产地，外国商人在这些地区搜刮的原材料主要是通过上海输送到各国的。到1853年，上海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已经超过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③随着上海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上海的商业也随之发展起来。最初以机织布的贩卖为中心，后来营业的种类逐渐多样化。在当时的上海县城和租界，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店铺开张。到19世纪80年代，上海已经成为一个繁荣的商业都市。

近代上海最早的工厂是由外国人建立的。19世纪40年代末，外国人开始在上海设立船舶修理工厂，接着面粉、制药和印刷等近代企业也纷纷出现。80年代，与电灯、电报等近代科学技术

^① 沈渭滨：《上海之崛起》，《上海研究论丛》第2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34页。

^② 前引文。

^③ 郑祖安：《近代上海都市的形成 1843年至1914年上海城市发展述略》，《上海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84年，第179页。

相关的企业也开始在上海出现。中国人设立的近代企业出现于 60 年代，这时洋务派在上海建立了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近代企业，在此影响下，由民族资本建立的近代企业也开始出现。至 90 年代，上海已经成为近代民族工业的中心，同时也迅速成长为中国最大的近代都市。开港之后，随着租界的设立，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上海 到 1905 年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外国人已经达到 12,328 名 到 1930 年居住在租界和上海市的外国人更是达到 58,607 名。^① 随着上海工商业的发展，从外地涌入上海的中国人也逐渐增多，特别是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农村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体制逐渐解体，许多农民失去了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 为了维持生计 他们不得不涌入像上海这样的城市 成为工人或商业的经营者，这就使得上海的人口急剧增加。1852 年上海的人口只有 544,413 名 到 1910 年已经达 1,289,353 名 到 1930 年更超过 300 万名 成为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②

近代上海不仅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东方著名的国际大都市，同时上海还是西方思想和文化传入中国的窗口。西方的思想和文化与中国传统的思想和文化在这里冲突、融合，给上海带来了新的活力。

上海的这种经济、文化背景使得中国革命党人把上海当作了主要的活动基地。1911 年 7 月，革命党人在上海设立同盟会中部总会，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从此上海成为中国革命党人活动的中心。不仅如此，上海还成为“那些出于追求经济利益和追求自由等各种目的的人士自由出入的巢穴”因此 那些对本国政府心怀不满者、策划各种阴谋的危险分子、社会的落伍者和腐败分子 各种浪人豪客齐聚于此。^③ 上海的这种复杂的背景成为韩人出于政

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 141 页。前引书，第 90 页。

上海寓客：《上海的解剖》，汉城《开辟》1920 年 8 月号 第 107 页。

治、经济目的移住上海的主要原因。

二、租界的设立和扩张

西方殖民主义者最初在上海设立租界始于 1845 年，在这一年，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尔福根据 1843 年签订的《虎门条约》第 7 条“但中华地方官必须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议于何地方，用何房屋或基地，系准英人租赁”之规定为依据，向上海道台提出设立英国人居留地的要求。^① 巴尔福和上海道台官慕久经过多次协商最后签订了《上海土地章程》，根据这一章程，英国人租赁了洋泾浜（现在的延安中路）以北、李家场（现在的北京东路附近）以南的土地，并可以在这片土地上建造房屋。次年界路（现在的河南中路）被定为西边的界线，这样就形成了占地 830 亩的英国租界。^② 这也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上海设立的第一个租界。

英租界设立之后，美国圣公会的主教蓬恩（William J. Boone）在得知苏州河北岸虹口一带的土地价格很低后，在没有得到中国政府许可的情况下就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住宅和教会，1848 年终于从上海道台那里得到许可，将虹口一带作为美国人的居留地。但是双方并没有签订关于租界四周界线的协约，1863 年美国驻上海领事西华德（Seward）和上海道共同决定了居留地的界线，同年 9 月英租界与美租界合并成为公共租界。

法国驻上海领事看到英美先后在上海设立本国人居留地，也向中国政府提出设立法国人居留地的要求。1849 年 4 月 6 日法国首任驻上海领事 M. Montigny 与道台麟桂会同划定了法租界的边界，其边界定为“南至护城河，北至洋泾浜，东至广东会馆（即湖州会馆）至洋泾浜一段河岸，西至关帝庙至周家木桥一段（现在在西

^① 《上海租界的历史》，吴圳义编《上海租界问题》，台北中正书局，1980，第 10 页。

^② 徐公肃、丘瑾璋：《上海公共租界制度》，《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 68 页。

藏南路附近)面积为 986 亩。①

这样到 19 世纪 50 年代,上海就形成了英国人居留地、美国人居留地、法国人居留地和上海县城并存的局面,这些居留地习惯上称为租界。1863 年 9 月 21 日,英租界和美租界合并成公共租界,这样上海的布局再次发生变化,形成了公共租界、法租界和上海县(后来为上海市)三分天下的局面,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 1942 年废除租界为止。

英美租界合并成公共租界之后,公共租界开始在租界外修筑道路,试图扩大租界,这就是所谓的“越界筑路”。1898 年 2 月,公共租界当局向上海道台提出扩大租界的要求,但是遭到了拒绝,于是便通过驻北京各国公使团向清政府的总理衙门再次提出扩张租界的要求,结果同年 5 月上海道台同意把杨树浦和周家嘴以南的土地以及泥城浜(现在西藏南路附近)以西、苏州河以南、洋泾浜和五圣庙(现在延安西路东段附近)以北、静安寺以东的土地划归公共租界管理,这样公共租界的面积一下子扩大到 32,110 亩。1915 年驻上海各国领事团与中国政府官吏通过协商,决定把虹口一代和闸北条路以南、苏州河以北的土地以及静安寺以西、沪西兆丰公园以东的土地也划归公共租界管理,这样公共租界的面积就增加到了 52,570 亩。③

徐公肃、丘瑾璋:《上海公共租界制度》,《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22 页。

从古代到现在,上海的行政区划发生了无数次的变化。在春秋时代,这片地区属于吴国,到了战国时代又先后隶属于吴国和越国。到明代,上海属于松江府,而到了清代,上海地区设有 9 个县,清末又设置了松江府,下属华亭、娄、上海、青浦、金山、奉贤和南汇等 7 个县。此外这个地区还设有太仓州,下辖嘉定、宝山和崇明三个县。1926 年上海地区属于江苏省沪海道,后来上海市和江苏省又被分开。1927 年 4 月 7 日,蒋介石在上海设立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作为最高管理机构。同年 7 月 7 日,上海特别市政府正式宣告成立,其管辖区域为上海县全部和宝山、松江、青浦和南汇等县的一部分。1930 年上海特别市又改称为上海市,到 1949 年没有再发生大的变化。(周振鹤、傅林祥:《上海行政建置沿革》,《上海研究论丛》第 10 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

《上海西人居留区域(俗称公共租界)界外马路扩张史》,吴圳义编:《上海租界问题》,台北中正书局,1980,第 27 页。